

走过青春

在陕北山村过大年

姜华信

中国人的年，泛指阴历年。每逢过阴历年，全家人团聚在一起，高高兴兴过大年。

在延安插队3年，两次在延安过大年。虽已过去50余年，但想起在延安过大年的场景，犹在眼前。

老乡家里过大年

第一次在延安过年是1969年。我们刚从北京来到延安东川的一个小山村插队。到队时距离春节还有13天，已经感受到了过年的气氛。家家户户都在推碾子磨面，平时过得再艰苦，这个年不能耽误。

时至冬闲，进了腊月，除了队里小煤窑的挖煤工和饲养员还在劳作之外，乡亲们大都歇工了，各家各户也都在准备过年。贴春联、剪窗花、砍柴、打平伙、编闲传，还有从沟掌川道里走出来的送亲队伍，新媳妇蒙着红盖头，骑着毛驴，唢呐声声，一时间打破了山村的宁静。

我们初到村，各项准备不足，不能独立开灶做饭。队里就安排我们到老乡家轮流吃派饭。这也让我们大开了眼界，领略了陕北老乡过年的喜庆气氛，品尝了乡俗茶饭。

过年期间吃派饭，享受的饭食可不一样，至今还不忘其中的香甜。

四虎是赤脚医生，从我们住的窑洞下一个小坡就是他家。临近年关，一走进他家窑洞，整个人就被热气所笼罩。窑里暖暖的，主人招呼我们盘腿坐上热炕头。四虎婆姨性格开朗，之前见了几次面，已成了熟人。她端着一个大红漆盘放到我们面前，只见盘中放着一只大老碗，碗中香喷喷的炖羊肉冒着热气，散发着辣子香。吃着喷香的羊肉真是解馋。吃罢羊肉，接着又是一人一碗荞面饸饹，吃得我俩肚

圆。饭罢，我们掏出纸烟递给四虎，他也赶忙递过旱烟让我们品尝。我们说，还是旱烟解劲儿。四虎说：“等你们划了自留地，我给你们烟籽，你们就可以种旱烟，省得再花钱买纸烟。”

当初以为是玩笑，也没当真。谁知分了自留地后，我们知青一商量，果然委托四虎给地里种了旱烟，并让他代我们管理。到了秋天，旱烟收获，又让他帮我们烤干取杆。从此，我们成了吃抽不分的一家人。

保业在我们村也算个文化人。记得我刚来村里，第一次踏入分给我们的窑洞，就看到他拿着报纸在糊墙。我问他叫什么？他说：“我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由此熟悉。

没想到的是，大年初一那天，恰巧轮到我们在他家吃派饭。我和一位同学过了村中间的冰河，沿着小山坡往上走，到了他家门口，保业看见我俩，就挡着自家的狗，招呼我们进了窑。

保业家境不太好，可待人却是真诚的。我们坐在他家炕上不一会儿，他就给我们端上来了热汤扁食和油馍馍。油馍馍是黄米面做的，圆圆扁扁，中间一个窟窿眼，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食品，吃起来倍儿香。从此，我与油馍馍结了缘。至今，每年也总还要吃两次。虽然如今的油馍馍依然好吃，可再也尝不出当年的味道。

知青一起过大年

1970年秋后，北京支延干部老张来到我们队，协助大队管理知青工作。他来了以后有三个大动作——办知青大灶、整理知青账目、学习毛著。总而言之，一句话——凝聚知青队伍。

往事不一定如烟

胡德水

那是1969年的2月4日上午10点钟，当绿皮火车从北京站缓缓启动的时候，车上哭声一片。过了一个小时左右，车厢里除了个别人还在轻轻抽泣，大多数人都恢复了平静，开始聊起了天。经过了两天一夜的车程，2月5日下午4点多，我们到了铜川，当晚就住在了那里。

当时，由于陕北下了大雪，导致交通受阻，所以我们在铜川住了两天。这两天，没事干的我们就出去转悠。在铜川，我平生第一次来到煤矿工人住的窑洞。窑洞里收拾得很干净，主人热情地招待了我们。

2月7日的早晨，我们的住所处来了很多辆军队里的大卡车。这些卡车的轮胎上都裹了粗粗的防滑链。所有同学都上了卡车。随后，卡车就在布满厚厚积雪

的盘山路上行驶。卡车虽然有帆布棚，但依然挡不住呼呼的北风，所以车上还是很冷。

大约当日的10点30分左右，卡车来到了洛川县的京兆公社，我们下了车。这里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大多数是京兆公社附近的群众和各生产队派来接在自己所在队插队知青的社员。当时，公社开了一个欢迎知青的大会。公社的领导对知青代表讲了话，然后就各自分开去自己插队的地方了。我们插队的地方是高家河大队的水渭生产队，来接我们的是几个年轻人。由于他们说的是方言，我们也不大听明白他们的话，所以彼此之间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时，陕北黄土高原那纵横交错的沟壑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这使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诗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脚踩着厚厚的积雪，我们走了十多里路，来到了村里。村里的人都在等着我们。见到我们后，社员们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并为我们做了很有陕北特色的面条——裤带面，还有各种酸菜和油辣子。当时的我们是第一次吃这样的饭，感觉很香。

2月7日，令我难以忘怀。从此，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开始了我们的知青岁月。这里是我们的新家，也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这一切，已经过去了53年。然而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永远挥之不去。都说往事如烟，我说往事不一定如烟。因为，这是我们永远也忘不了的记忆。

再喝一碗洛川水

——忆在洛川插队之峥嵘岁月

陈桂林

我从小生长在北京，除了学习需要自己努力以外，生活等其他方面从不考虑。夏天玩得热了，渴了，就跑到自来水管处，打开水龙头先喝个够。再将头伸到水龙头下面冲凉洗个痛快。到洛川插队之前，暑假期间，我经常到长辛店大宁水库游泳、到小河沟里抓鱼。那时候，水对于我来说随处可见，到处都有。因此，我也从没有意识到水的重要。1969年初，我响应国家号召，赴延安洛川秦关公社柳家庄插队。几十年过去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就是洛川的水。

我插队的秦关公社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区的塬面上，这里用水极其困难，日常生活主要依靠深井里的地下水。秦关公社有井的村子不多，我插队落户的村子共有三口井。十几丈深的井一眼见不到底。打水的时候，要靠人力用井绳把井底装满水的桶向上拉，洛川人称之为绞水。绞水的时候，一般三人一组，一个力气大的人向上绞，另一人拉着井绳，还有一人负责向家里担水。

我们每次打水前，要先到保管井绳的人家去借井绳。井绳有3指粗，女知青要两个人用棍子才能抬动。到了井台后，先将绳子的两头拴好水桶，并将井绳放入辘轳的槽中。一个人蹲在井边拉着绳索，另一个人将水桶放入井中。拉井绳的人将水桶缓缓往下放，待感觉到井绳重力加重，那便是水桶已经装满了水。便将另一空桶放入井中，配合摇辘轳的人使劲向上拽井绳。起初，摇辘轳和拽井绳的人都要

用力。等到装满水的木桶上升的高度超过了下降的空木桶的高度后，人们也就逐渐省力了。

当时，人们只要一见井台有人打水，便将自家的桶也担了来。不一会儿，井台边便围了一群排队打水的老少爷们，他们抽着旱烟聊着闲话。有的年轻人主动帮助女知青打水。

可吃水对于没有井的村子就难了。人们喝的都是窖水或者要到山沟里挑水。1990年以前，洛川农村喝窖水是很普遍的事，几乎家家都有集雨水窖。水窖和水井是一个原理，区别在于两点：一是深浅不同，井深窖浅；二是水质不同，井是地下水，窖是雨水。雨水充沛的夏天，洛川农民就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下雨，窑背上的水自然就流进了窖里，可保全年饮用。但是，在我们插队的那个年代，对于没有井的村子来说，这样干净卫生的集雨水窖也很少，因此吃水特别困难，人们常去沟里抬水喝。这些村子为了解决家畜用水，就建成了涝池。因此，涝池也成了洛川农村的一大亮点，好多知青也有在涝池游泳的经历。在洛川，还发生过知青在涝池救当地小孩的感人事迹。北京知青刘永强在武石公社上操村救孩子的英勇事迹就在洛川广为流传。干旱季节，洛川老太婆们组织孩子们祈雨，大人们常常在路边或低洼处挖一个坑。下雨时，雨水顺着路边沟渠不断流入坑中，储存起来作为牲口的饮用水。

关于喝窖水的经历，我始终铭记在心。这段经历使我懂得了节约用水。那是1969年的一个夏天，我们去洛川秦关南界村赶乡会。当时天气炎热，一路走过去，我们累得满头大汗，口渴得厉害。当我们几人到了南界村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水喝。我们找到当地的知青，向他们要开水喝。他们说没有开水。我在农村也生活了半年，知道农村为了省柴，经常不烧开水。这个我也理解。就说：“凉水也行。”他们说：“凉水有，不过你们要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我不理解。看着地上的几个暖水瓶，就问他们：“暖水瓶里没有水吗？”他们回答说：“都是空的。”

不一会儿，有人把水打来了。只见他们其中一个人蹲在地上，把纱布叠成几折垫在暖水瓶口上。另一个人弓着身子，用水桶从桶中把水舀出倒入暖水瓶。随着窖水的倒入，只见垫在暖水瓶口的纱布上滤出各种杂质和鱼虫。一层鲜活的红鱼虫还在纱布上不断蠕动……他们每倒完一杯水，就将纱布上的杂物抖掉，再重新放好。重复多次，窖水过滤好了，暖水瓶也灌满了。我们接过杯子“咕嘟、咕嘟”一饮而尽……

几十年过去了，据了解，洛川县已经解决了水的问题，城乡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同甘共苦的亲人们也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期待疫情过后，能够回到家乡，看看家乡的亲人们，再喝一碗洛川的水。



● 新春快乐



● 春节好



● 鸣钟贺岁



● 欢天喜地

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